

王林 著

不想速成，不想不劳而获。



顾颉刚

Gu Jiegang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顾颉刚

王林 著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: SK16N148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顾颉刚/王林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
2017.5

(大家精要)

ISBN 978-7-5613-8876-1

I. ①顾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顾颉刚(1893—1980) —
传记 IV. ①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5754号

顾颉刚 GU JIEGANG

王 林 著

责任编辑 刘 定

封面设计 张潇伊
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60mm × 980mm 1/16

印 张 10

字 数 100千
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8876-1

定 价 20.00元

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3879 传真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

丛书编委会

总 策 划：来新国 王文成

编委会主任：郭齐勇 周晓亮

编 委：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
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
乌 琛

目 录

第1章 “恨不能读尽天下书” / 001

天生读书种子 / 001

买书成瘾，藏书盈室 / 005

第2章 “大禹是条虫”引发的风波 / 010

“禹为动物，出于九鼎” / 010

“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” / 013

第3章 “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” / 016

时代、个人和境遇 / 016

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观 / 023

“在史学上称王了” / 026

第4章 “建设全民众的历史” / 031

“虽是无稽之谈，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” / 031

“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” / 033

妙峰山的香会 / 037

在南国播撒民俗学的种子 / 039

第5章 “在真实的学识里

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” / 042

创办《禹贡》杂志，成立禹贡学会 / 042

重视实地考察，用心培养人才 / 047

第6章 “你的方法就是达尔文的方法” / 050

历史演进法 / 050

以研究故事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历史 / 053

伪史移植利用法 / 056

多所见闻，以证古史 / 057

创新与沉潜 / 058

第7章 “愈驳得猛厉，我愈感谢” / 061

“多辩论一回，总可多少得些成绩” / 061

“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” / 066

“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，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” / 068

第8章 始于疑而终于信 / 073

“所以有破坏，正因求建设” / 073

“非有此破坏，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” / 077

“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，如今人之相与语” / 079

第9章 “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” / 083

“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，不当问用不用” / 083

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 / 087

“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” / 093

第10章 “我的性情过于爱才” / 096

“此种胸怀，尤为余特所欣赏” / 096

拼命发讲义，逼学生搞研究 / 099

人生一乐 / 103

第11章 “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” / 109

学问上的野心收不住 / 109

不求近功，乐于晚成 / 116

嗜学如命 / 118

第12章 “未能尽其才，但已尽了我的力” / 121

二重人格与不能分工治学之苦 / 121

“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” / 123

“求全之毁”和“不虞之誉” / 127

生活的艰窘 / 129

第 13 章 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和播种者 / 134

从中心人物到史学大师 / 134

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最先奠基人之一 / 136

国外的影响 / 141

学术精神 / 143

附录

年谱 / 146

主要著作 / 151

第 1 章

“恨不能读尽天下书”

顾颉刚生于读书世家，幼承庭训，聪明好学，还不会走路就认识很多字。十一岁就开始逛书摊，十二岁时就发出“恨不能读尽天下书”的感慨。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图书馆编书目。终其一生，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，爱读书、爱买书、爱藏书，读书、买书、写书、教书成了他生命的存在方式和人生的全部追求。

天生读书种子

1893 年 5 月 8 日，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悬桥巷顾家花园。

顾家在苏州是读书世家，康熙皇帝下江南时，闻顾家文风之盛，曾誉顾家为“江南第一读书人家”。顾颉刚的祖父顾廉军是秀才，以幕僚为业，对《说文》和金石很有研究，著有《说文通俗》十四卷及《古慕轩印蜕》八册。其父顾子虬也是

秀才，早年以教馆为业，曾被江苏省考送京师大学堂，因学校津贴无法养家而返家，任小学国文教员。后为生计所迫，先后任南京造币厂文牍、杭州仁和场盐运署科长。

顾家人丁不旺，当顾颉刚出生时，顾家已很久未听到小孩的声息了。由于他是祖父母的长孙，因此受到极浓挚的慈爱。又由于生在书香之家，尚在提抱之中，就由祖父教令识字，以至于还不会走路时已认识不少字。当家人抱他上街，他指着招牌认字时，店铺中人甚感诧异，以为是前世带来的字呢！后来他母亲教他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，父亲、叔父又教他《诗品》《天文歌诀》《地球韵言》等。因此，顾颉刚很早就能自己看书，六七岁时已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古书。

顾颉刚六岁入私塾，读四书、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礼记》等。读《论语》时知道了许多古人的名字，读《孟子》时便能从其叙述道统的话中分出他们的先后，并写成一篇五页的小史，其对历史的兴趣竟如此浓厚。顾颉刚读书不肯盲从，经常在书中的经文和注文中批抹，发表自己的见解。

顾家藏书丰富，顾颉刚每天从私塾放学回来，就偷偷看祖父、父亲及叔父所藏书籍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我的翻看书籍，并不是要功课做得好，得着长者的赞许，只觉得书籍里的世界比我日常所处的世界大得多，我遏不住我好奇的欲望，要伸首到这大世界里探看一回。”他姑丈家里有一座“黄金阁”，是藏书的地方，他一到那里，就上阁埋头翻书，别人呼唤也不出来，这事在亲戚间传为笑谈。

由于酷爱读书，家中的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需求，于是顾颉刚就开始到街上的大小书摊买书。他把过年时长辈给的压岁

钱和平时得到的点心钱，积攒起来，瞒着家人，到书铺中挑拣自己喜欢的书籍。他祖母生活节俭，但对孙子买书却极为慷慨。顾颉刚十一岁时就天天出入书肆，一年下来能买五六百册。

顾颉刚在私塾期间，除读经史子集外，还阅读一些介绍西学和新思想的新书，如他买的第一本书便是《西洋文明史要》。他还经常阅读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，特别对《少年中国说》《呵旁观者文》这样慷慨激昂的文章尤其欣赏，梁启超那种浅显畅达而又感情丰富的文章对他作文有很大影响。

在私塾期间，有两年没有正式教师，顾颉刚由此得以放纵自己的读书欲望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这两年中，为了功课的松，由得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。我要读书，便自己到书铺里选着买；买了来，便自己选着读。我看了报纸，便自己发挥议论。有什么地方开会，我便前去听讲。要游戏，要胡闹，要闲谈遣日，当然也随我的便。这两年中进的境真像飞一般的快，我过去的三十年中吸收知识从来没有这样顺利的：我看无论哪种书都可以懂得一点了，天地之大我也识得了一个约略了。”

1906年，十四岁的顾颉刚进入苏州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，接受新式教育。入学不久就因患病休学。在家养病期间，他自读《汉魏丛书》及《二十二子》，对古书了解更为全面。入学后，又对上海出版的《国粹学报》着了迷，托人将《国粹学报》全部买来，在校内阅读，有一次竟忘记了考试。

1908年，顾颉刚进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。与好友王伯祥、叶圣陶经常出入书肆，并对目录学发生了兴趣，《四库总目》《汇刻书目》《书目答问》一类的书翻得极熟。由于翻书

太多，所以各种书很少能从第一字看到最后一字，常常是一部书未读完，又随着问题和兴趣读下一部，甚至第三部、第四部。在中学二年级，他每晚放学回来，又跟祖父学习《周易》《尚书》和《礼记》，已感觉到古书中有很多问题。

这一时期，他仍大量买书。有一次，他在书肆中见到一部《惜阴轩丛书》，便与书商讨价还价，书商以十八枚银圆为底线，不肯再让。这对他来说是一笔巨款，凭自己的私房钱是不可能凑够的。于是，他只好连日纠缠他祖母，说尽好话，连平时祖母要他做而他不肯做的事都答应了。最后，祖母满足了他的要求，终于将那部书买回来了。由于买书太多，有一年，竟负书债二百余元，他不敢向家中要钱，只得向同学借。有些书他带回家，并不想将来如何还债，只要能多看几眼，用手摸摸，过过瘾就满足了。到年底结账拿不出钱来，只得将书还给书铺。

1913年，二十一岁的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因报农科，被编入二部。受同学毛子水的影响，开始改变随便翻书的习惯，依秩序读书。有一段时间，他每晚去听章太炎讲学，深受启发，得知今古文经学的分歧。

1914年，顾颉刚改入预科一部，读书更用功。自己规定八种书，每天依次点读。在读书时，他总喜欢把自己的主张批在书上，书端写不下时，便写在笔记簿上，由此养成了坚持一生的写读书笔记的习惯。1915年初，他因病休学一年，回到苏州家中，便开始按照自己的兴趣来进行古籍考订工作，写成《清代著述考》一书。

1916年，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。1917年，蔡元

培任北京大学校长，实行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，聘陈独秀、胡适来校任教。顾颉刚初次听胡适讲课，极为震动，很佩服胡适的眼光、胆量和裁断。从此以后，他在胡适的直接影响和鼓励下走上了疑古辨伪的学术大道。

1920年，顾颉刚从北京大学毕业，留校任图书馆编目员，这正是他最向往的工作，从此这位酷爱读书的书痴得以在书海里畅游。

买书成瘾，藏书盈室

顾颉刚工作以后买书成瘾，为此常常负债。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，有一次与朋友上街，在四马路集成书局发现一部段玉裁的《春秋左氏古经》，是两部《皇清经解》中没有收进的，便出两元四角买下。卖书人见他买此书，就问还有一部毛奇龄的《春秋毛氏传》要不要？顾不敢多买书，就搪塞说，要买《春秋毛氏传》，不如买《毛奇龄全集》。他本以为全集必是书铺所没有的。不料卖书人说，这里有一部全集，可以看看。这部全集价钱很贵，在北京要卖百余元。顾当时买不起，于是就说过一天再说吧。可卖书人说，书就在这里，看看也好。于是就拿出来让顾颉刚看，并劝他买。顾本来不想买，又急于脱身，就说我至多出价五十元，不卖就算了。不料卖书人竟答应了。这下再无法推辞，只得买下。为此，他不得不将代父亲收的田租借来一用。他为此深深地自责，并写信给妻子希望她不要生气。

顾颉刚爱买书的嗜好一生未曾中断，他女儿回忆说，父亲

生活节俭，他的嗜好就是买书，但手头并不宽裕，常为了看到一部盼望许久的书却无钱购买而感到苦恼，一旦凑够了钱，往往托别人去买回而自己不敢去书店，因为怕到了书店再看到其他想买的书又引起新的苦恼来。

除个人买书外，顾颉刚在 1927 年还曾受中山大学委托，赴江浙一带代购图书。在去杭州购书之前，他曾做《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》一文，详细说明购书的宗旨和内容。他认为，以前人看图书是载圣人之道的，所以藏书的目的是要劝人取它做道德和文章的。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增进知识了，我们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齐收来，使得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，专家们也可以致力研究。他计划所购图书资料有十六类：经史子集及丛书、档案、地方志、家族志、社会事件之记载、个人生活之记载、账簿、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、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、宗教及迷信书、民众文学书、旧艺术书、教育书、古存简籍、著述稿本、实物之图像。经过四个多月的购买，共购书约十二万册，花费五万六千余元。

这份《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》，既充分反映了作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对历史资料的认识，也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它后来作为《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》之一出版，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对这份计划书推崇备至，写了一篇很长的《书后》，评价道：“我拜读了顾先生的《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》之后，心中十二分的佩服。他这《计划书》的篇幅，虽是很短，但是含义甚深，计划周密。所要说的，都说过了。我对于他的计划，不敢赘一辞。

他拟的十六大类，已经把所有的材料，包括殆尽，更不容有所添减。我只是以图书馆学的眼光，来读这篇文章，觉得它非常的有价值、有意义，值得我们图书馆学的人注意。顾先生虽不是专门研究图书馆学的人，但是他所说的，没有一句不合于图书馆学原理，没有一事不合于图书馆的范围。而且不尚空论，把实际的计划和各类书籍购求之必要，详述无遗，尤令人钦佩！”又说：“我相信若是我们能够依着顾先生的计划，去搜罗古籍。本着上述数点，去打破传统的观念，扩大图书馆范围，实行科学的管理。这非但于中大图书馆前途有无限的发展，既于中国图书馆界也有重大的贡献。”现代著名图书馆专家顾廷龙对这份计划书也极为看重，他在1981年回忆说：“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事将五十年，即循此途径为收购目标，颇得文史学者称便。”

顾颉刚一生藏书丰富，但在战乱的环境中也有较大的损失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他匆匆离开北平，所有存留在燕京大学成府寓舍的图书、稿件、信札，由顾廷龙代为保管。后形势发生变化，顾廷龙感到成府寓所已不安全，便找侯仁之相助，征得燕大总务处同意，将这批书稿存入燕大临湖轩司徒雷登校长住宅之地窖。图书装了二十余箱，约有三万五千册之多，另有两箱讲义和稿件。他的另一些零种藏书，约万册，由顾廷龙存于燕大学生宿舍四楼。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人接收了燕京大学。第二年，顾颉刚存于校长住宅之书稿全被日本1821部队经理部劫去。稍后，其存在学生宿舍四楼的书籍也被日本华北综合调查所劫去。顾颉刚得知后极为痛惜，他说：“此项图书约五万册，稿件、信札等则有十余岁至四十岁三十

年中积累也。”

顾颉刚原在北平城里的书物，大部分存于禹贡学会，而稿件、信札等存于天津中国银行仓库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人接收银行，清理仓库，将其中的存物拍卖。顾颉刚的好友章元善之弟章元群得知后，又代为收赎，改存在浙江兴业银行，才得以保存。当顾颉刚后来打开木箱，看到昔日的日记、笔记、游记、信札时，不禁“热泪夺眶，若获亡子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顾颉刚回到上海，并将北平劫后的藏书运到上海，将其中凡有史料价值者，全部捐给上海合众图书馆。他说：“我从有知识起，处于一切剧变之中，就想搜集资料，保存这一伟大时代的史实。当清朝末年，我在中学读书；民国初年，我在大学读书。每天散课后，走上街头，总爱在地摊上寻寻觅觅，得到些各地方、各政权、各党派、各事件的文件和书刊。北京是全国政治的中心，地摊上这类东西特别多，因为光顾的人稀少，价格便宜，往往十几枚铜圆就可买来一捆。在这里，可以看到维新运动、民教相仇、辛亥革命、洪宪帝制、张勋复辟、军阀混战、官吏横暴、政党斗争、反动会道门欺骗活动等史实。这些资料，经不起天天搜集，到我四十多岁时已占满了三间屋子。”抗战胜利后，他将劫后幸存的收集起来，这类近代史资料还有两万多册。由于上海的房屋容纳不下，又考虑到学术研究战线应当缩短，所以就全部捐给了合众图书馆。爱书如命的顾颉刚并不想把图书资料据为己有，而是要为时代变化留下记录，为学者研究提供方便。

1954年8月，顾颉刚到北京工作，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。此次搬家，最大的工程就是图书运输。他在上海、

苏州两地的藏书共装二百二十五箱，约九万册。科学院为其包了两节火车，全部运到北京。中科院将顾颉刚安排在干面胡同中科院宿舍，即清朝大学士李鸿藻府邸之正房，面积有二百平方米。顾颉刚为了整理书籍上架，就忙了两个多月，房屋四墙从地面至天花板排满了书箱，室中多放置书柜。尽管如此，仍不能容纳全部图书，不得不忍痛将大部头的书籍出售。

1980年12月25日，八十八岁的顾颉刚在北京病逝。他所藏六万册图书，依照他生前“藏书不散”之愿，由家人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，存于该馆的“顾颉刚文库”。这批图书既是顾颉刚一生读书治学的见证，也是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史料，它在成就顾颉刚辉煌事业之后，仍将泽被史林，浇灌后学。